

毛泽东与《孟子》中的志气与道义

□ 曹应旺

毛泽东诗作中有两次用典出自《孟子》。一次是1918年4月,《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名世于今五百年”,用典出自《孟子·公孙丑下》:“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一次是1958年7月,《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六亿神州尽舜尧”,用典出自《孟子·告子下》:“人皆可以为尧舜。”毛泽东自幼就接受包括《四书》在内的传统文化教育,而《四书》中的《孟子》是地位仅次于《论语》、篇幅最长的一本书,也是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书。《孟子》中的志气、道义都深深地吸引了毛泽东。

一、关于《孟子》中的志气

(一) 尚志与养气。孟子崇尚大志向,《孟子·尽心上》记载:“王子垫问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何为孟子的大志向?这体现在孟子说的两句话上:“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夫天未欲治平天下也;如欲治平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要实现这个大志向需要有志气的“气”。《孟子·公孙丑上》将志与气结合起来:“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孟子重视“养浩然之气”,认为“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其养法是“配义与道”。孟子的“浩然之气”即后人说的“正气”“骨气”“气节”,是中国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的“浩然之气”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英雄豪杰,文天祥是其一,留下了“天地有正气,于人曰浩然”的豪迈诗句。

孟子的“浩然之气”也影响和激励了毛泽东。早年毛泽东读泡尔生《伦理学原理》所写的批注中写道:“吾之意与孟子所论浩然之气及大丈夫两章之意,大略相同。”全面抗战一周年时,毛泽东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及死难同胞大会,在大雨中为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奠基,在哀乐声中为死难者敬献花圈。毛泽东向抗日阵亡将士献的挽词是“抗战到底,浩气长存”八个大字。

(二) 志气的恒与坚。孟子所谈的志气有一个“恒”字,即《孟子·告子上》讲的不是三心两意、“一日暴之,十日寒之”,而是持之以恒、“专心致志”。1915年,毛泽东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自勉:“贵有恒,何必三更起五更眠;最无益,只怕一日暴十日

寒。”1917年,毛泽东在《体育之研究》中写道:“凡事皆宜有恒,运动亦然。有两人于此,其于运动也,一人时作时辍,一人到底不懈,则效不效必有所分矣。”

孟子所谈的志气有一个“坚”字,即《孟子·滕文公下》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1939年5月30日,毛泽东谈什么是模范青年时说:“要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这个方向是不动摇的,要有‘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骨气来坚持这个方向。”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被国民党特务杀害。7月13日,毛泽东、朱德致李公朴家属唁电,用孟子“大丈夫”的志气赞扬和吊唁李公朴的美德,文中写道:“先生尽瘁救国事业与进步文化事业,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今为和平民主而遭反动派毒手,是为全国人民之损失,抑亦为先生不朽之光荣。”

(三) 志气的磨砺。志气是需要磨砺的。毛泽东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引用《孟子·告子下》的一段话:“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他在《讲堂录》中有这样的记录:“惟安贫者能成事,故曰咬得菜根,百事可做。”

战争时期,毛泽东曾对方强、李银桥等多人谈过孟子的这段话。1943年4月9日,他将孟子这段话中的句子随手拈来,在给陈毅的信中写道:“凡事忍耐,多想自己缺点,增益其所不能。”经济困难时期,他多次阐明“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

1965年7月,毛泽东女儿李讷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毛泽东送自己喜爱的四句话给女儿作为座右铭,第一句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二、关于《孟子》中的道义

(一) 志于道。《孟子·尽心上》中讲:“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在孟子眼里君子是“志于道”的人,即追求道义的人。不经过日积月累取得一定的成就,就不能通达事理,就像流水不填满地面上的坎坎洼洼就不会前进一样。毛泽东很喜欢孟子的这段

话,从长沙求学时起就重视“志于道”,重视知识和德才的积累。他在《讲堂录》中写道:“孟子曰:流水之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浅薄者流,亦知省哉。”

毛泽东一生都喜爱与“志于道”的人交往,讨厌见面就谈吃喝玩乐的人。党的七大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见了面,不要只讲生活怎么样,不要把生活问题变成主要的话题。”

(二) 道义决定生死。孟子所讲的道,有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规律的意思;有时讲的是方法;更多的从人类社会角度讲的是道义。程颐认为“孟子有功于圣门”的另一个突出贡献是:“仲尼只说一个仁字,孟子开口便说仁义。”《孟子·告子上》中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的仁是仁义的仁,孟子的礼是礼义的礼,孟子的道是道义的道。孟子认为道义决定生死,决定治乱。《孟子·离娄上》有一段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话:“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毛泽东在蒋家王朝败亡时挥笔写下《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那“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的诗句,不正是强调了道义决定生死吗?毛泽东那样重视群众路线、重视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既有马克思主义之根,也有孟子“有道”“正道”思想之源。

从治国的角度看,孟子所讲的道就是“尧舜之道”。《孟子·公孙丑下》中讲:“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在孟子看来,尧舜之道就是遵循人本来就有的诚心善意、顺民心以仁政治理天下之道。所以《孟子·告子下》赞成“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说法,认为“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

毛泽东欣赏孟子所讲的尧舜之道,尤其欣赏“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平等观。他强调的“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全军一致”,是以平等为基础的。他所希望的众志成城、凝聚力、战斗力,正是“平等”生出的效力。1958年7月1日,毛泽东在《七律二首·送瘟神》中写道:“春风

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自那之后,春节写对联、贴对联,年年都有老百姓写“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这副对联,贴这副对联。“六亿神州尽舜尧”,是毛泽东对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意气风发走正道的赞颂。

(三) 道义决定胜负。从军事角度看,孟子认为得道才能得到胜利。《孟子·公孙丑下》有这样一段话:“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

毛泽东非常重视孟子的这段话,重视战争中天时、地利、人和因素,他说:“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部队之情况,都将不能取胜。”他尤其重视人和因素,在《论持久战》中阐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失道寡助;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得道多助。他指出:“日本虽能得到国际法西斯国家的援助,但同时,却又不能不遇到一个超过其国际援助力量的国际反对力量。这后一种力量将逐渐地增长,终究不但将前者的援助力量抵消,并将施其压力于日本自身。这是失道寡助的规律,是从日本战争的本质产生出来的。”他认为中国则相反,“由于中国战争的进步性、正义性而产生出来的国际广大援助,同日本的失道寡助又恰恰相反。总起来说,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这些都是中国的特点”。

后来,毛泽东多次讲邪不压正,得道多助,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是失道寡助的。1970年5月上旬,美国出兵侵入柬埔寨,扩大印度支那战争。5月20日,毛泽东发表《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声明,声明中说:“无数事实证明,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弱国能够打败强国,小国能够打败大国。小国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大国的侵略。这是一条历史的规律。”

(摘自2018年第1期《党的文献》,原标题为《毛泽东谈孟子》)

周恩来工作台上最后记录的

□ 芮原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被确诊罹患膀胱癌。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也未停止工作。

他的工作台历记录得清晰而明确:从1974年1月1日至6月1日住进医院准备接受手术的这139天中,每日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的有9天,工作14小时至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的有5天,只有13天的工作量在12小时之内。

从中可以发现,时年76岁且抱病在身的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在超负荷工作,不间断工作超过18小时的天数占到近1/3。从3月份开始,病情日益加重的他,靠输血和其他治疗坚持工作,从5月2日到住院前才开始在工作之余定时做治疗和休息。

据其3月26日的工作台历记载:“下午三时,起床/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晚七时,陪餐/晚十时,政治局会议/晨二时半,约民航局同志开会/晨七时,办公/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下午二时,休息”。连续工作长达23个小时,这只是他在那些日子的一个缩影。

从住院后直至去世,周恩来接受大小手术13次,大约每40天就有一次手术,但只要身体尚能支撑,他仍继续坚持工作。期间,除了批阅、处理一些文件外,同中央负责人、中央部门及有关方面负责人谈话216次,接见外宾63批,主持召

开或参加会议40次……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周恩来身上最鲜明的崇高风范。
(摘自2018年第2期《党史文汇》,原标题为《周恩来工作台历上的故事》)



闻一多读书

□ 冯忠方

闻一多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著名诗人、杰出学者和民主战士。一首著名的《七子之歌》诗让闻一多先生享誉海内外。

闻一多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黄冈市的一个书香门第,自幼就喜欢读书,特别爱好古典诗词和美术。5岁入私塾启蒙,和他一起读私塾的小朋友都好玩,他却不大爱玩,而喜欢坐在书斋里读他的书。1912年13岁时以复试鄂籍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大学前身),在清华度过了10年学子生涯。喜读中国古代诗集、诗话、史书、笔记等。

1922年,在他新婚的那天,亲朋好友一大早就前来贺喜,直到迎亲的花轿快到家门口时,人们还到处找不到新郎。急得大家东寻西

找,结果在书房里找到了他。他仍穿着那件旧袍,手里捧着一本书,兴味正浓。还是别人把他从书房里拉出来成亲的。

有一次,他在室外看书,由于着了迷,结果一条大蜈蚣爬到了他的鞋子上也不知道。从旁经过的嫂子看到后惊叫起来:“蜈蚣咬你的脚啦!”闻一多还以为嫂子同他开玩笑,没有理睬,继续读书。他的侄儿眼疾手快,抓过一把笤帚把蜈蚣扫到了地上,又狠狠踩了两脚。谁知闻一多不领情,还怪侄儿胡闹,打断了他读书的兴致呢!

闻一多虽然在47岁就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但其著书立说甚丰,著作估计有500万字。闻一多还博学多才,除新诗与古典文学研究外,在美术、戏剧、书法、篆刻等方面也有相当高深的造诣。这些都与闻先生的好读书是分不开的。

(摘自2019年8月29日《人民政协报》)

印象中的父亲

我于1940年5月27日出生在八路军总部,那正是百团大战筹划时期。1940年8月20日,百团大战开始了,因为父亲前线指挥工作的需要,母亲准备带着我离开八路军前方总部,赶赴延安。当时我出生还不满百日,父亲特意抱着我与母亲合影留念。谁能想到,这一别竟成永别。我是看着这张全家福长大的,这也是我们一家唯一的合影。当时威武刚毅的父亲露出了难得的笑容,年轻漂亮母亲一脸幸福,依偎在父亲温暖怀抱中的我更是悠然自得。

1942年5月,日军集结3万多兵力,对太行山之麓的八路军总部和二九师首脑机关进行铁壁合围。突围中,父亲牺牲于山西省辽县,也就是左权县。

父亲的战友告诉我,那次战斗很惨烈,收尸的时候迈不开脚,尸体连着尸体。经历战争的人都不愿回顾战争,只有一次,彭伯伯(彭德怀)回忆起父亲,深情地说:“你爸爸一定知道,那次敌人打的第一颗炮弹是试探性的,第二颗炮弹准会跟着来,躲避一下是来得及的。可他为什么没有躲避呢?要知道,当时十字岭上正集合着无数的同志和马匹,你爸爸不可能丢下部下,自己先冲出去。他是死于自己的职守,死于自己的岗位,死于对革命队伍的无限忠诚啊!”

父亲牺牲后,大家一直有意瞒着我奶奶。1949年夏天,人民解放军挥师湖南时,朱德指示路过父亲家乡的部队要派人去看望她老人家。当进入醴陵的部队高唱《左权将军之歌》,派人慰问奶奶时,才告诉她:“左权没有回来,我们都是您的儿子。”奶奶颤颤巍巍地摸出了一个布包,里面有1942年9月周恩来委托秘书钱之光从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寄来抚恤款时的书信;有

回忆我的父亲左权

□ 左太北(口述) 周海滨(整理)

1949年3月叶剑英设法由香港转道寄来的一个金戒指和一两黄金。

我在延安保育院长大。新中国成立后被送进北京八一小学读书。我本来是个普通的孩子,从老师和同学对我的关心上,我就感觉到父亲很伟大。学校里的主要活动都让我去做代表,1952年6月1日,学校派了7个同学给毛主席汇报,去讲我们进城以后的学习生活,就让我去了。毛主席见了我,一听是左权的女儿,特意拉着我的手,问我家里的情况,还跟我照了一张照片。周总理在北京初次见我时勉励说:“你是左权将军的女儿北北吗?长得挺像你爸爸,一定要向你爸爸学习!”

1957年,因为母亲到外地工作,我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就被接到了彭德怀伯伯的家里,一住就是两年多时间。彭伯伯对吃特别注重,他并不讲究吃得好不好,但是很在意大家吃饱了没有。每次看到我扒拉两下就把饭菜一扫而光,他都一副高兴的样子。我想,彭伯伯对饥饿的感觉体会太深了,他当初参加革命就是为了大家都有饭吃。我永远都记得1962年彭伯伯为我题的字:“送太北,希望你永远青年。”我从不为享受不到父爱而遗憾,我的生命中有爸爸、彭伯伯两个伟大的人,我觉得特别幸福。

虽然和父亲分别时不足百天,但父亲的形象在我的印象里极为清晰。二年级时,写了作文《我的爸爸》。文中

说:“我的爸爸是左权,他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副参谋长。1942年5月25日,爸爸在山西辽县麻田十字岭与日寇激战时壮烈殉国。我为有这样的好爸爸自豪,我要向爸爸学习,做党的好孩子!”

父亲与母亲

我妈妈从小生长在北京,和她的6个姐妹个个如花似玉,被誉为“七仙女”,她身段玲珑,肌肤雪白,讲话时声音清亮。不仅如此,她博览群书,文采好,下笔千言;更有一手好书法,北师大女附中的不少同学以其字为帖。母亲曾经和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一起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是学校的组织者之一。1936年投身革命工作,1937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经担任北平市民先区队队长。

1939年2月,母亲随中央巡视团到太行山巡视,代表中央妇女讲话,一下子引起朱德夫妇的注意。父亲从苏联学习回国10年一直独身,朱德很关心他的婚事,多次和夫人康克清商量着要给他介绍个合适的对象。朱德亲自出马,找到了我母亲。问明情况后,就坦言向她介绍父亲左权:“这事用不着多考虑啦!我看你们二人彼此都不会有意见。”康克清也对我母亲说:“像左副参谋长这样的人,这样的条件,怕你到别处再难找到第二个了。”

1939年4月16日,我的父亲、母

亲在潞城北村八路军总部结婚。父亲极为珍惜自己的婚姻,对妻子呵护有加。不久,母亲怀孕,早期反应很厉害。当时她住在北方局妇委,父亲每天傍晚都骑马从总部驻地去看她,一直持续两个多月,这在行伍出身的高级将领中实不多见。周围的男同志都知道参谋长爱老婆,女同志都羡慕我母亲有个体贴的丈夫。

婚后一年,我出生了。父亲将妻女接回八路军总部,夜里亲自爬起来为我换尿布。1940年8月,因筹划百团大战太忙,母亲带着我回到了延安。两人远隔,母亲情绪极不稳定,刚离开前线又想重返前方和丈夫在一起,她给丈夫写了很多信。父亲百忙之中给妻子回信,反复安慰妻子,不厌她的牢骚,每封信里都是字字情深。信中,父亲详细描述了前方残酷的战斗,说每逢敌人扫荡,女同志和小孩子是极受罪的。他劝慰我的母亲安心:“尽管我可能会越走越远,只要我俩的心紧紧靠在一起,一切就没问题了!”然而,分别21个月,父亲却牺牲在十字岭反扫荡的战斗中……父亲的牺牲给了她巨大的打击。那时才25岁的她,怀着巨大的悲痛独自抚养我,还要坚强地学习和工作。母亲曾给我写了一封信,回顾并倾吐了自己短暂的感情经历,每当谈起这些信,我抑制不住地泪流满面。

父亲很爱兰花,因为一看到兰花他就会想起母亲,母亲名字中也带一个

“兰”字。我真切地感到,父亲深深地爱着我们母女。如果没有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我们将是多么幸福的一家啊!

父亲牺牲后,母亲曾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怀念父亲的文章:“虽几次传来你遇难的消息,但我不愿去相信,切望着你仍然驰骋于太行山际,并愿以20年的生命换得你的生存,或许是重伤的归来,不管带着怎样残缺的肢体,我将尽全力看护你,以你的残缺为光荣,这虔诚的期望终于成为绝望……”

1991年5月,母亲被查出罹患淋巴瘤,开始经化疗的折磨。10月,病重的她用颤抖的手写下最后一纸文字:“人生实在过得太快了,坎坎坷坷,忧忧患患,直到闭紧了眼睛……”

迟到的父爱

我对于父亲的印象是完全模糊的,只是完全没有意料到的是,当我已步入人生第42个年头时,却忽然收到了母亲寄给我的一叠家书。

1982年5月,母亲给我寄来当年父亲写给她的11封信(实有12封,1封遗失),这些都是在“文革”中被查收,1981年底才返还给母亲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有这些信,也是我第一次对父亲有了感性认识。原来父亲在我中就有一个英雄形象,看了信以后我才觉

得,我有一个那么爱我父亲。
“太北身体好吗?没有病吗?长大些了没有?更活泼了没有?方便时请一告我。”

“记得太北小家伙是很怕冷的,在砖壁那几天下雨起风天气较冷时,小家伙就手也冰冷,鼻子不通,奶也不能吃吗……当心些,不要冷着这个宝贝,我俩的宝贝。”

“差不了几天太北就一岁岁了。这个宝贝小天使我真是喜欢她。现在长得更大更强壮更活泼更漂亮,又能喊爸爸妈妈,又乖巧不顽皮,真是给我极多的想念与高兴。可惜天各一方不能看到她、抱抱她。”

“不用担心你及北北,你入学后望能好好地恢复身体,有暇时多去看看太北,小孩子极需人照顾的。”

“不要忘记教育小太北学会喊爸爸,慢慢地给她懂得,她的爸爸在遥远的华北与日寇战斗着。”

虽然父亲多次在信里问及我,但他一辈子只有一句话是说给我的:“告诉太北,我在前线战斗。”

关于我,父亲给妈妈最后的嘱咐是:“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父亲对所有事都是深思熟虑的,可以想见,他在指挥作战的间隙一直在考虑我的问题。这就是,必要的时候,准备把他的孩子也献出去。为了革命,他把自己最珍惜的一切都奉献了。

这11封信,是我今生今世最珍贵的宝物。

(摘自2018年第4期《江淮文史》)

